

书桌，对于如今的百姓家庭来说，实在是太平常不过的家具。回想我的人生旅途，那曾经拥有过的四张书桌，却是我人生的一个缩影……

第一张是“擦板书桌”

1958年，我在泰康路小学读书，家住在原打浦桥地区的一个“下只角”棚户区。当时我家父母和兄弟姐妹共6口人，只居住一间10多平方米的棚屋。我和二哥睡在连头也抬不起的“阁楼”上。其实所谓阁楼，也就是“吊搁床”而已。当时家里生活用品仅有“四大件”：一只竹榻床，一只父亲用旧木板自己钉的、摇摇晃晃吃饭用的四方桌，一只做饭用的煤球炉，一只吊在墙上的竹编小碗橱。

家里生活非常艰苦，仅靠父亲一人在斜徐路马路菜场摆蔬菜地摊维持生活，根本没有条件为我买一张书桌，即便有钱买书桌也没地方摆。因此，我上小学做作业只能用一块尺寸较小的次衣裳擦板，放在双腿上做书桌，我管叫它“擦板书桌”。到了小学高年级时，人长大了，本子也多了，父亲发现我用的擦板太小，又买了一块尺寸大一点的擦板给我“改善一下条件”。有时我参加课外学习小组，学习小组是按弄堂编组的，我们棚户区的几位同学编在一组，这些同学也和我一样，是用次衣裳擦板做功课的。

这“擦板书桌”使用起来很不适宜。我坐在一只低矮的小板凳上，两腿要并拢，膝盖上放上擦板，擦板的齿角朝下、光面朝上。人就弯着腰、低着头做作业。时间一长就腰酸背疼的，要站起来伸伸腰腿再做，如此硬是坚持了6年。1963年在南昌中学读初中时，我担任班长，算是学生小干部。班主任王丽娟老师有一次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将背挺起来，你都像个小老干部了。”这时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有点驼背了。

一等奖与“菜缸书桌”

到了初中时，由于姐姐和哥哥工作了，家中经济条件开始好转。正巧我家隔壁的一位邻居搬迁留下了一间棚屋，父亲买下，我家便有了两间棚户房。我住在新买来的一间棚屋里，有了一张用砖叠加做脚，上面铺几块木板的床铺。但家里仍没钱为我买书桌，当时想拥有一张书桌简直成了我的梦想。因为此时我人高多了，再用“擦板书桌”很不方便。有一天，我在斜徐路咸菜作坊找到一口半人高、被丢弃的小号咸菜缸，赶紧叫来父亲，用自制的滑轮木板小车将其拖运回来。缸约1米多高，两端小中间鼓凸，有点像绍兴老酒罐。我在上面放一块方木板，铺上一张旧报纸，就拥有了第一张“菜缸书桌”。

我在“菜缸书桌”上摆放一只吃完酱菜后的空酱菜瓶作笔筒，还放了一只从旧货摊淘来的锈迹斑斑的马蹄闹钟。我做功课时，要两腿趴开，肚子顶着缸肚，人伏在木板上。有一次不小心，人偏向了木板一侧，整个人一下跌在地上，摔了个鼻青眼肿。有时做功课累了伏案打瞌睡，也会跌落在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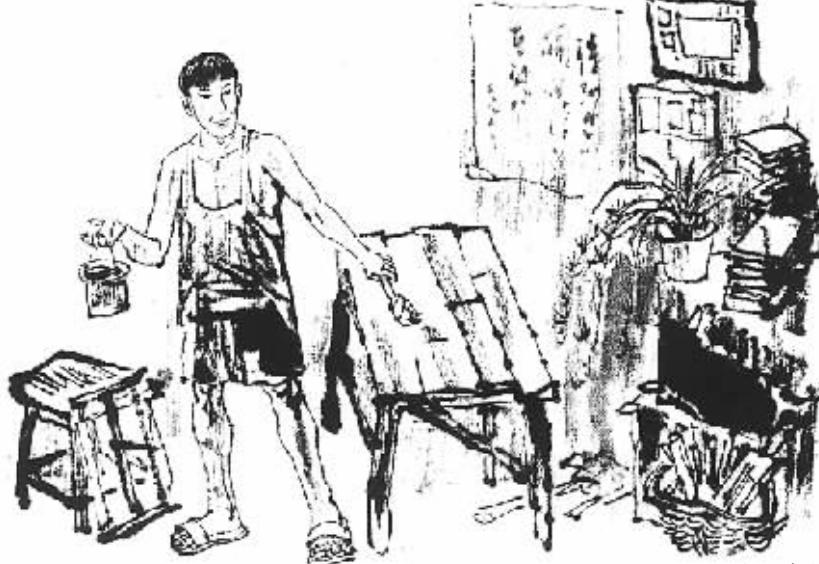
就是在这个“菜缸书桌”上，我读了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复活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青春之歌》《红旗谱》《狂人日记》《艺海拾贝》等从旧书店淘来的名著。条件虽差，但我总是快乐地伏在“菜缸书桌”上做功课、读小说、写作文。初中三年级，我的第一篇获奖作文《动温的学生时代》就是在这张“菜缸书桌”上诞生的。

刷桐油的“简易书桌”

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我所在的棚户区改造，我们家分得两室户过渡性的简易公房，那只“菜缸书桌”终于完成了它的“历史使命”。1968年我工作了，不久又调进卢湾区政府机

四张书桌的故事

◆ 周劲草



本版插图 叶雄工作室



关，后来还当上了宣传科长。写作不仅是我一贯爱好，更是工作的需要，所以，我很想有一张真正的书桌。但那正是“文革”时代，我们“老三届”参加工作的均为“36块万岁”的工资，我还是买不起书桌。当时我使用的书桌，是在“计划供应木材”情况下，排了一整天的队，凭户口本在瑞金二路一家旧木材行买来一些旧木材做的。当时挨个排队的人都像称青菜萝卜一样，按斤头称到一大堆杂七杂八的旧木柴，决不让你拣的。回到家后我经过分类整理，将其中好一点、面积大的木板做了一张圆台面，因为我们兄弟姐妹多，相聚吃饭时很需要。而书桌的材料，是拣下来的许多小块木板，恳请木匠师傅拼凑打制成的。当时我连最便宜的油漆也舍不得买，只买了一点桐油，将这张“简易书桌”刷了一下。

我终于有了第一张像模像样的书桌了，尽管是“简易”的。但是我很满足，很开心。我在这书桌上摆了一盆我喜欢的吊兰，青枝绿叶的，书桌上方的墙上则挂着一幅我用毛笔临摹的毛主席诗句“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”，还挺浪漫的呢。就是这张“简易书桌”，留下了我许多的读书随笔和一些练笔性的习作，对我从事30多年的街道党工委宣传科长工作和业余写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这张“简易书桌”一直用到我结婚成家，我把它送给了斜徐路上一位摊煎饼的山东大妈了。

“正宗书桌”镶了块板

1981年我结婚了，住进复兴中路永裕里一间双亭子间，这时我总算有了第四张书桌。

宠“孩子”

胡一芳

直没当一回事，最近老是像针刺似的疼。下个休息日我就带母亲去医院检查。

在去医院的路上，母亲说：“这个肿块已经4年多了，看你们平时忙，不想给你们添麻烦，所以一直忍着没说。”我听到母亲这样说，火气一下子蹿了上来：“有毛病应该尽早看，

为什么忍着没说！既然不想说，就永远别说！如果毛病拖大了，那不是更麻烦吗？”母亲一副做错了事的样子，一声没吭。我连忙挽住母亲的胳膊，柔声地说：“以后只要身体觉得不舒服，要早点和我们说啊。”

到医院排队挂号，医生诊治，然后付费、

瘦夫者谁？鄙人也；胖妻即是我的那一半。40多年前结为连理时，我身高1.72米，她1.60米。我们体重都在120斤上下，我略重她2斤。她年轻时水灵灵的大眼睛，笔挺的高鼻梁，皮肤白皙而细嫩。上街时，常会招路人的回首一瞥。偶尔听到“这对倒是挺般配的”赞许声时，我俩会对视一笑，心里甜滋滋的。

“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”。1990年开始，也不知啥原因，在体形上我们两人开始分道扬镳、大相径庭了。她像吃了发酵粉，体重不断递增，125、130、135……迄今已是165斤的胖夫人了。我则从135斤（婚后胖了几斤）向下递减，135、130、125……直至目前不足百斤，成为地道的干瘪老头子。朋友们戏谑我俩是“劳莱、哈台”（早年美国影星，一瘦一胖）。上街，也有人调头一望，听到的不是赞许，而是：“瞧这对老头太太，嘻嘻，哈哈！”

老伴欲购件合身的服饰，跑遍大上海所有服装店，都难买到。听说老西门的全泰服装店专售中老年服装，大尺寸应有尽有。她兴冲冲地跑去，挑特大型的穿在身上，依然是紧绷绷的。问是否有再大的？营业员无奈地摇摇头：“没有了。”

我欲买件合适的衬衫，也非易事。市场上最小尺寸38厘米的，穿在身上，领口尚能容纳一个拳头。买儿童衬衫吧，式样又不合适。只能定制，当然花费要大些了。

公交车上的双人座，她一人就要占去三分之二，旁坐的乘客常被挤得眉头紧皱。但倘若是“陪坐”，倒正好“拾遗补缺”。

女性多爱美爱苗条。为减肥，她先后服用了多种减肥保健品，有的服后还会拉肚子，一天七八次跑卫生间，“减”得苦透苦透。数千元的健身器，还有什么减肥内衣、减肥皮鞋、减肥拖鞋……凡是能减肥的，不惜金钱，都买来尝试，结果是肥肉一斤未减。她减肥不成，为了我俩在形体上能和谐一些，我增肥总不成问题了吧？餐桌上，凡是富有营养的食物，总是堆在我面前，她还买来广告上讲得花好稻好“男人不再瘦”的保健品让我服用，几年下来，我却依然如故，一斤肉也未增。有朋友取笑她说：“你虐待老头子，好的都自己吃了。”这真是天大的冤枉。

俗话说，“千金难买老来瘦”。说句心里话，我可并不是愿做这种老来瘦的，可就是胖不起来，奈何？

有次到庙宇里去参观，见那尊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和手执破芭蕉扇的济公佛，恍然有所感悟。菩萨都有胖瘦，更何况人？胖与瘦、高与矮，这种自然现象，可能与基因有关吧，似不必强求“标准”。

我是武当拳术爱好者，练功数十年，追求的是健体强身，延年益寿，与胖瘦何干？老伴也很健康，每次体检，除有轻微脂肪肝外，一切正常。我俩吃得进，睡得香，跑得快；胖能耐寒，瘦能抗热，连伤风感冒也没有。我们医保卡上的资金，除配些蚊叮虫咬的外用药外，基本不去动用。晨练时，许多老年人还羡慕我们的健康身体哩。

我们老两口，隔三差五还外出旅游，登山涉水，生活得快活着哩，瘦夫胖妻，其乐也融融。

预约B超、拍X光……一套程序下来，所幸诊断是良性的。在这些过程中，我让母亲坐在椅子上等我，我楼上、楼下地跑。办好了所有的手续，挽着母亲下楼时，母亲忽然说：“刚才看着你忙碌的样子，突然想到你们小时候，不管到哪里，我总是抱着你们、牵着你们。现在却是你们牵着我了……”

出医院门时，雷阵雨已经停了，来时的担心和不安也消去了不少。我对母亲说：“我们去兜马路，给您买件衣服吧！”母亲笑着说：“好的，我要买上次看中的那件……”